



从「寒门贵子」到「老公思聪」

□ 魏新丽

父辈们从泥土中拔出双腿，子辈则成为新兴市民。这些新晋中产阶级开始掌握话语权，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。他们对于贫穷已经没有太多切身体验，因而体现出一种疏离和嫌弃。相反，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捧变得光明正大。

所以，年初上海女子江西年夜饭事件得以迅速发酵，这正是底层与中产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。这不仅是物质上的

差距，更是观念、文化的差距。而朋友圈中，《我为什么拉黑了朋友圈的穷人》之类的文章广为传播。在各大论坛，对出身寒门的凤凰男女的讨伐也层出不穷。在此背景下，贫穷甚至成为一种原罪，是衣服上要藏起来的污垢。

贩卖苦难的励志故事也渐渐失去市场。典型的例子是，在近些年的草根选秀节目上，已经鲜少看到真正的底层之人。出身农村的“大衣哥”可能算是极少的特例，他从“星光大道”走出，而这个节目的受众恰好是70后以上年龄段的人群。受众更为年轻的“中国好声音”等节目，已绝难看到“大衣哥”这样特征鲜明的真正底层。参加选秀的选手，大多受过良好教育，至少是中等家庭出身。而时下自称草根的人群，很大一部分恰是中产或者中产的预备役。

总之，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大张旗鼓地歌颂苦难之下的努力，而是更看重出身背景带来的平台、学识、眼界、资源和人脉优势。眼下对王思聪的追捧就顺理成章了。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富二代，他既有接地气的一面，同时又自带炫富光环。对他的追捧，代表着富人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的时代到来。他们被摘下“为富不仁”的帽子，成为全民偶像。经常有

人说，“可怕的是那些比你有背景还比你努力的人”，比如柳传志的女儿柳青的奋斗史，让很多人大呼，一个努力的富二代，让我等草根完全没有活路。

一边对寒门出贵子仍心存期望，一边哭着喊着叫思聪老公，这反映出中间阶级的焦虑和不安。他们害怕阶层下移，沦落为“下流阶层”，时刻保持着对“破产”的恐慌。于是，他们寄希望于社会阶层的流动，以使自己获得上升的空间，同时又要与下面的阶层划清界限，怕一不小心又跌落其中。而通过对王思聪等成功人士的追捧，他们又借此与上面的阶层建立链接，得到一种安全感。“有钱即正义”，有钱，就可以维持阶层的稳定。

40年间，成功学已转向。寒门出贵子的世界观仍在，但方法论已经在坍塌的道路上。寒门子弟主要的晋升通道越来越狭窄。高考虽然相对公平，但提供的流动性已经大不如前，所能撬动的天平越来越有限。以北大为例，2000-2010年间，农村新生仅占10%，而上世纪80年代-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%。对于很多底层人民来说，通过高考出人头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
如果说父辈们依然天真地相信奋斗改变命运，那么，现在的年轻人早就看清了现实，看清了贫富差距造就的巨大鸿沟。这种觉悟伴随着阶级固化的进程而加深。因此，在感情上，大家依然期待寒门能够出贵子，希望中下层通过努力跨越阶层的壁垒。但是理智上，人们已经逐渐在天平上加大了出身背景的砝码。是“寒门贵子”还是“老公思聪”？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，选择其实已一目了然。

【所谓潮流】

分答的游戏 认真你就输了

□ 俞耕耘

前日当朋友问起，你了解分答吗？我一愣，脑海里闪过一款昔日的碳酸饮料“芬达”。呵呵，幸好我没吱声，否则难免有“聋子瞎打岔”的尴尬。默默在网上一搜，原来它是果壳开发的语音付费问答应用，走俏蹿红，成为所谓“知识变现”的新通道。

“分答”，望文生义，即一分钟的回答，秒秒都能变钱。它带来福音，仿佛大量“知道分子”终于迎来春天，奏响了“知识就是硬货”的诱人序曲。表面看去，分答的飙红颠覆了知识免费廉价、理应共享的强盗逻辑，将“付费才能共享”作为一种思维意识，输入到当下每个人的大脑皮层沟回里。

事实上，这不过是一次“知识意淫”的游戏。分答完美做到了“游戏产品的开发”：提供游戏平台，设定游戏规则（怎样分成、如何偷听），至于提问者、回答者，不过都是玩家而已。从王思聪引爆分答，就能看出其中端倪：这将是网红、明星和大咖们“暴露”、展示的又一战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样看是否太过褊狭？毕竟很多行业能手、专业人士都已进驻这一平台答疑解惑。然而，分答的规则决定了它的海拔和深度。它一面将付费阅读的好习惯借用、推广，一面又无力提供知识获得感。如果动动脑，就会发现“一分钟语音能回答的问题”往往既不是专业知识，也并非心得体会，它充其量不过是常识、判断、情绪、套话或隐私。当你去门诊多问医生几个为什么，医生会不屑地告诉你：“我学了那么多年，三两句就能给你说明白。”60秒能给你传授知识，你以为分答是“大师集结号”？

这里还未包含：口齿不清、口吃结巴、南腔北调、一堆“然后”废掉的秒数。要清楚地总结陈词，就需要回答者字正腔圆、字字珠玑、句句箴言。你以为每个回答者都是辩论赛选手？“必须用语音回答”这个规则，纯属出于游戏的猎奇。其实，它的用意很明显，利用语音牢牢圈住一批声控人群的癖好。声音永远不会和知识有关，却能满足一些提问者的想象。“偷听”的耳朵甚至能听出这声音是否性感、知性、狂野或者公主病。

“偷听”的功能更值得我们玩味。我想它足以让你检讨：你是否总在各种聊天群里默默潜水，窥视别人聊天？分答告诉你，白听没戏，交出一块钱，才能“偷听”。这真是一个格调不高的“进步”——偷窥是可以的，但要付费。“偷听”功能的收益由提问者和回答者平分，甚至“偷听”的收益远远超出提问者的支出成本。这种规则简直具有了隐喻意义：收益在于提问者噱头挖掘和回答者隐私暴露的配合演出。越能引起“偷听”的问题，越是好问题。

变现思路无疑催生了一批所谓“中国好问题”：请问富豪你买不来啥东西？请问你的择偶标准是啥？请问你在女朋友身上花多少钱？难道这些提问者都是“狗仔”退化而来？

大批网红的狡黠在于，他们的回答用废话代替假话，说了套话却不说真话；遇到长问题会说：详见我的文章链接，遇到不会的又说，我把钱私下退给你。分答也暗合了一种平庸的懒人思维，所谓“轻盈地获取”就是用别人的脑子回答自己的问题。你的脑子是否寄存在别人的篮子里？也许这种“上纲上线”很没必要，回答与提问本就是娱乐精神的表演和围观。

知识变现、共享经济或许只是分答的口头禅，潜台词却是在说：我们只是游戏，认真你就输了。看病要去医院，学习要去读书，经验要凭实践，成功需要教训。分答其实只提供缩水版的鸡汤、脑筋急转弯的小聪明、付费版的真心话大冒险等诸多玩法而已。

为什么会有「少儿不宜」

□ 王昱

副产品：小说既然是“体制外文学”，当然不会考虑少年儿童读者的需求，相反，由于皇权专制下的平头百姓们平素正能量看得太多了，到了皇上管不着的地方当然要越重口味越好，而作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跨越重重阻碍来看，当然要写得越重口味越好。在这些“重口味”桥段中，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是宣传“造反有理”：《三国演义》中还文绉绉地讲“天下土地，唯有德者居之”，等到了《水浒传》里，好汉们想得就比较直

白了：“杀奔东京，夺了那皇上的鸟位”，到了《西游记》里更绝，从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居然把玉帝打下宝座了。

其次，小说中暴力情节比比皆是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猎户杀了妻子把肉献给刘备下酒，《水浒传》中李逵劫法场排砍人头，林冲风雪山神庙对昔日好友剖心挖胆，凡此种种，如果我国国产电视剧像某些人呼吁的那样“忠于原著”，估计血腥程度绝不会在美剧《冰与火之歌》之下。

再者，情色也是小说中少不了的桥段，明代版四大名著（那时叫“四大奇书”）中是有《金瓶梅》的，如果曹雪芹后来没有写《红楼梦》顶了它的缺，四大名著对少儿宜还是不宜估计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。然而饶是如此，在替补上场的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同志开场就在梦中与警幻仙姑那啥，醒了又跟袭人那啥，再后来又跟嫂子秦可卿那啥——说这些桥段都适合给孩子看恐怕绝非实话。

所有小说都是有写作目的的，而“体制外文学”出身的四大名著最初写作目的其实就是要泄，让作者和读者狠出一口在现实中被礼教和皇权压抑已久的气，所谓文学价值即便有也排在这个目的之后。所以它们确实不适合儿童读，因为那是被憋出来的東西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所谓“儿童文学”本就是个很晚才出现的概念，18世纪以前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其实都没想

过给儿童专门编故事。近代以前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与今天的父母刚好是反着的，他们鼓励孩子尽早接触那些“很黄很暴力”的东西，以便了解真实世界的残酷。“儿童文学”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大思想家卢梭，他在《爱弥儿》中对儿童的天性极为推崇，将他们描述成了最纯真、最善良的群体，反对把“成年之后的罪恶”灌输给儿童，号召给这群“最善良的人”写专门的文学故事。在他的号召下，一批大思想家开始将那些流传已久的传说轶事过滤加工，编成儿童文学讲给孩子听。从那时开始，西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就是作家群体中最理想的群体，而儿童文学则是一种难度极高、备受尊重的文学创作形式。反观咱们中国，由于没有卢梭那个认识高度，“编给孩子听的故事”至今仍是故事情节简单粗陋、逻辑经不起推敲的代名词，大部分作家只有在正经文化圈里混不下去了才会想起写儿童文学。这就难怪朱学东要感叹中国儿童文学如此粗糙了。

不过，中国儿童文学被边缘化倒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四大名著逆袭的经历为我们提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规律——当你被边缘化了、没人管了，你反而有可能成功。如此说来，中国儿童文学可能也会有雄起的那一天。只不过到时所产生的成果到底是否还是“儿童文学”？会不会变得跟四大名著一样少儿不宜？这事儿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